

孟子

皇家
读本

张居正讲评
《孟子》上

上海辞书出版社

孟子

张居正讲评

《孟子》
上

陈生玺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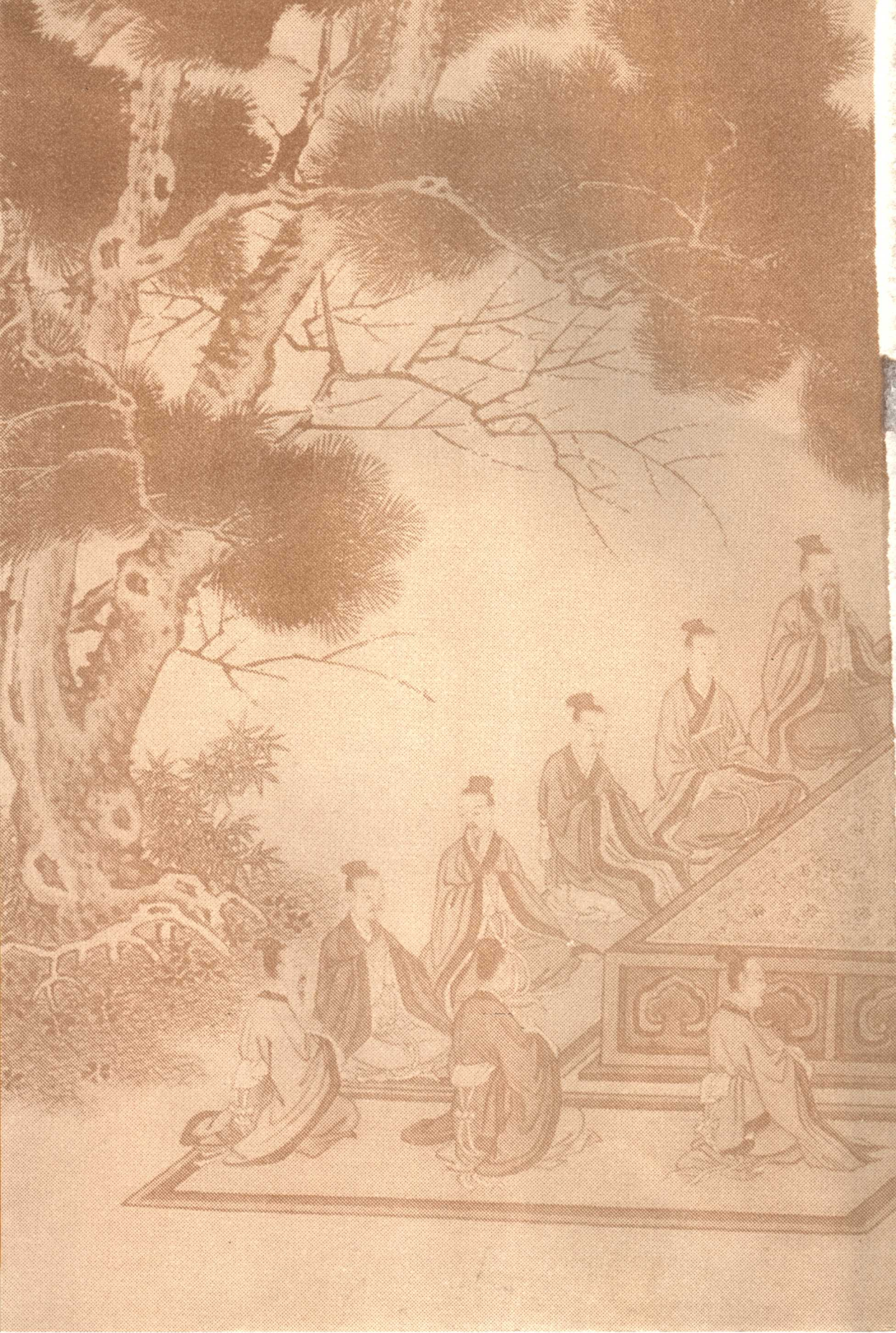
上海辞书出版社

陈生玺

本书主编，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著有《明清易代史独见》、《清史研究概说》(合著)等，

主编有《张居正讲评〈资治通鉴〉皇家读本》等。





主 编

陈生玺

编 者

王德培 何程远

陈生玺 贾乃谦

王淑艳

序

熊召政

上海辞书出版社将要出版张居正讲评“四书”系列之《张居正讲评〈论语〉》这本书，我听后感诧异。因为在我对张居正的研究中，无论是他自己的书信奏疏，还是《明通鉴》、《三编发明》这样的史书，均不见对此书的记载。询问编辑，告之乃据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海内孤本，心下更为称奇。即请求编辑将书稿寄来一阅。读其讲评章句，乃张居正语气无疑，典型的蒙童读本。这个蒙童不是别人，正是明朝的第十四位皇帝朱翊钧。

一

朱翊钧于1572年即皇帝位，时年十岁，起用他的老师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三十八岁时，就曾担任过嘉靖皇帝儿子裕王的老师。这个裕王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朱载堉。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朱载堉嗣登大位，于当年就拔擢张居正为内阁辅臣。张居正时年四十二岁。两年后，朱载堉又安排张居正担任太子朱翊钧的讲师。就这样，张居正成为隆庆、万历父子两位皇帝的老师。

张居正四十八岁主政内阁。用他自己的话说，彼时“主少国疑”，张居正同时担负起主政与帝师的双重责任。

关于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振衰起隳的历史功绩，史家多有定评。我在这里仅就张居正帝王师的身份作一点评述。

明代的帝王师分为两种：一种是皇帝经筵的讲臣，多从翰林院中的词臣挑选；还有就是东宫的讲师，负责太子学习的专门机构即詹事府。大凡太子登基，都会拔擢自己的老师到内阁担任辅臣。明代的首辅中，不少人都是太子老师出身，因此，当太子的老师比当皇帝的老师，似乎政治前程更大。

张居正是在隆庆、万历两位皇帝登基之前，担任他们的讲臣，所以，他先后得到父子两位皇帝的信任与重用。所不同的是，他只是隆庆皇帝的讲臣之一。当时隆庆皇帝有五位老师，分别是高拱、李春芳、赵贞吉、殷士瞻与张居正，主讲官是高拱。所以，隆庆皇帝登基之后，这五个人都相继入阁，但隆庆皇帝最为倚重的还是高拱，故让高拱当了首辅。

万历皇帝为太子时，只有四岁。他六岁出阁读书，张居正成了他的主讲官，这为张居正日后出掌内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古代，能够当上帝王师是一种难得的荣耀。古人有言：“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这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但真正能实现这一理想的读书人却少之又少。明代选择帝王师，虽然有非常苛刻的条件，但已当上帝王师的，从其作为来看，大部分都很平庸，极为恶劣或出类拔萃的，都比较少。究其原因，大致在两个方面：一是挑选帝王师的条件制订有误。帝王师首要的条件是学问渊博，其次是品行端正，单从字面上看，这两条绝对正确。若要认真探讨，就会发现，在明朝，所谓学问渊博，就是对孔孟的儒家学说，做足寻章摘句、阐微辨意的功夫。若培养学者，此类学问尚无不可，但培养君王，用这一套，便觉隔靴搔痒。二是在读书人看来，帝王师高不可攀，但他除了“师”的身份，还有一个“臣”的身份。皇帝虽然是学生，但更重要的是“师”的主子，老师跪着进讲，而学生却坐着听。单从这一点来看，所谓帝王师，也只是一个受到尊重的仆人而已。因此，老师进讲时，大都战战兢兢，除了按当年洪武皇帝钦定的孔孟之道来讲述，自己哪敢将经邦济世的学问掺杂进去呢？

二

作为首辅，张居正是成功的。李贽誉他为“宰相之杰”，一点也不过分。作为帝师，张居正也是称职的。

隆庆皇帝于1572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晏驾。半个月后，即六月十日万历皇帝登基。六天后，高拱的首辅被两宫皇太后罢免，张居正接任。八月六日，刚把祭祀大社、大稷的典礼举行完毕，张居正就以揭帖进奏“请以是月中旬，择日御文华殿讲读”。同时向小皇上建议：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接见大臣讨论国是，其余的日子则到文华殿参加日讲。他并亲自为小皇帝选择了马自强、许国、申时行、于慎行、余有丁等六位讲臣（这六人后来都先后入阁成为辅臣）。

当年的十二月下旬，张居正又向小皇上进献《帝鉴图说》。这本书是以连环画的形式，精选八十一则可以仿效的历代帝王治国之善举、三十六则引以为戒的祸国之恶行，讲述兴衰存亡的道理，每则故事配图画一幅。张居正主编这本书，可谓用心之深。在进疏中，他言道：

前史所载兴亡治乱之迹，如出一辙。大抵皆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厉，无不治者。

此时的皇帝才十岁，张居正不让他死啃孔孟，而是让他熟悉历代帝王之得失。可见，从一开始，张居正就铁定想培养一代明主而非培养一位秀才。窃以为，非有大忧患者，不会有这种大功德的举措。

《明通鉴》中，关于张居正如何作帝师的记载，有如下几则：

万历元年二月癸丑(初二)上御经筵，从张居正所请也。

一日，讲毕，上问：“建文帝果出亡否？”居正曰：“国史不载，但故老相传，披缁云游，题诗于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句。”上太息，命录诗进。居正曰：“此亡国事，不足观也，请录《皇陵碑》及高祖《御制集》以上，见创业之艰，圣谟之盛”云。

三月，丙申，诏举将才。

时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至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文吏箝制弁员，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精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嗣后将帅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权，俾得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乃是诏内外官各举其人以备任使。

这两则故事都发生在万历元年，神宗皇帝当时只有十岁。前则故事道出小皇帝的好奇心，想打听建文帝的下落。张居正及时阻止他的企图，因为他毕竟是高祖朱棣的十一世孙，正是他的祖先，当年发动“靖难之役”，从北京打到南京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叔侄争权虽是家事，但皇位从此落到朱棣这一脉系，毕竟来路有些不正。这件事在民间一直存有非议，许多人对建文帝抱有同情。朱翊钧少不省事，才打探这件事情。张居正若附和或者怂恿小皇帝为建文帝正名，势必会在朝野引起思想上的混乱，轻者摇撼政局，重则动摇国是，因此张居正才有以上一番言语。尽管当时就有人对张居正没有借此机会为建文帝表白幽怨隐恨表示不满，但从稳定政局角度考虑，张居正采取的方法无可指责。

后一则故事更是表明张居正以史为鉴，向小皇帝灌输“富国强兵”的思想。让小皇帝由古及今，认清当朝“武备废弛，文吏箝制弁员”的弊政，并由此作出推举将才的决定。张居正通过讲授，让小皇帝得到熟悉政事掌控大局的方略。这种方法，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

事实证明，张居正的教导卓有成效。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初一，天空出现日全食。在古代，大凡出现灾异，君王便认为是上天示警，便要立即检讨自己的过错。因此，就在这一天，小皇帝为对天象表示敬畏，在宫中制作了一块牙牌，上面写了十二件事：“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

当小皇帝将这一块牙牌拿给张居正看时，张居正非常高兴，趁机教导说：“此数事者，虽因天变自警，其实修身治天下之道理全在于此。皇上可终身奉行。”接着又说：“懂得这些道理并不困难，但要身体力行就不那么容易。从今以后，皇上所作所为，凡有与所写不一致之处，应允许左右执牌以谏。”

此时，十三岁的皇帝朱翊钧，与其说是一个好皇帝，还不如说是一个好学生。他对张居正十分尊崇，冬天经筵，他亲送银炉给师相暖手，夏天调制羹汤给师相品尝。张居正主政内阁十年，朱翊钧从未喊过他的名字，总是客客气气地称“元辅张先生”。此等殊荣，当朝大臣均羡慕不已。

朱翊钧长大后，张居正对他的严格教育也未停止。万历九年二月，张居正组织一帮儒臣编写的《列朝宝训》、《实录》成书，再次呈给皇上。

两书共分四十类：即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谨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侠，正宫闱，教储贰，睦宗藩，亲贤臣，去奸邪，纳谏，理财，守法，敬戒，务实，正纪纲，审官，久任，重守令，驭近习，待外戚，重农桑，兴教化，明赏罚，信诏令，谨名分，却贡献，慎赏赉，敦节俭，慎刑狱，褒功德，屏异端，饬武备，御寇盗。

从这四十个题目就可以看出，这部《列朝宝训》讲的仍是修身治国的道理。《帝鉴图说》是童蒙读本，而这部书则是货真价实的帝王学了。此时朱翊钧已年届十九，且已结婚三年，属于成年人了。张居正为他制订了更为庞大的学习计划。遗憾的是，此时的朱翊钧，已失却少年的纯真。他的祖父世宗皇帝的贪婪与刻薄，父亲穆宗皇帝的沉湎酒色等恶劣品质，已在他身上逐渐露出端倪。

三

从张居正讲评“四书”的用语来看，这部讲稿当与《帝鉴图说》同属一个时间段，都是讲给少年朱翊钧听的。

关于张居正的学问根基，一般都推为法家，但他对孔孟的儒家学说，的确也有自己的发明与创意。他不主张死读四书五经，而积极引导小皇帝参悟经书背后的内容，契合孔子发言时的心境与语境。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给湖广提督学道金学曾写过一封信。摘录如下：

夫以孔子之圣，平生所志，惟在东周，生今反古，深用为戒。老不得行其道，犹修《春秋》以存周典，此岂以周之法独善于前代哉？盖为天下之礼宜尔也。今世俗皆称“愿学孔子”，乃不务遵祖宗之典，以服官寡

过。而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趋为高，动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循情贾誉。此岂圣人所谓“为下不倍”哉，恶在其遵孔氏也！

不穀素无学术，谬膺重任，思所以鼓弩钝，佐明主者，惟日取我祖宗之法度修明之，然十犹未二、三也。窃以为今之教士，与士之为学，皆如不穀之所以事上致理者，而后有得于遵也之义，不识高明以为如何？

这封信的大致意思是，学孔若仅拘泥于字句，则非遵孔，而是抑孔、损孔。西哲有言，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袭其意用之，则一切学问皆是当世的学问。张居正特别强调“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趋为高，动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循情贾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复古学风。

给金学曾写信不久，张居正又给南京国子监司业屠平石写了一封信，对如何治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谓事与职者而行之，故与七十之徒切磋讲究。其持论立言，亦各随根器，循循善诱，固未尝专揭一语。如近时所谓话头者概施之也。告鲁哀公曰：“政在节财。”齐景公曰：“君臣父子。”在卫曰：“正名。”在楚曰：“近悦远来。”亦未尝独揭一语，不度其势之所宜者而强聒之也。

在这里，张居正进一步肯定孔子因地献策、因材施教的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研讨学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入仕为官之前，此时学习就以“修己治人”为主。入官之后，其研修学问则应以“称职免咎”为主了。前为励志，后为致用。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与七十门徒探求学问，坐而论道，是因为他周游列国而谋不到经邦济世的差事。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治学观崇尚务实而厌恶空谈。经他爬梳的孔孟儒学，立足于“用”而非稽古钩沉。

总而言之，作为帝师，张居正希望他的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开阔自己的政治视野，于历史的典籍中发掘治国的文化资源。客观地讲，他是一个好老师，但从朱翊钧日后单独柄政的行迹来看，则可以肯定地说，他不是一个好学生。

四

在中国历史中，帝师与皇帝，既是师生，又是君臣。有时候，帝师很好皇帝却平庸。有时候，皇帝渴慕知识而帝师不能传授经邦济世的韬略。像诸

葛亮之于刘备，魏徵之于李世民，刘伯温之于朱元璋，都属于千载难逢的君臣际遇，如云从龙，如风从虎。

设想一下，如果让张居正碰上刘邦，或让他碰上李世民，那将是一种何等辉煌的历史气象！但是，历史不接受任何假设。他所有的“富民强兵”的智慧与呕心沥血的栽培，只换回一个以勤勉开始以昏庸告终的皇帝。数百年之后，仍让人扼腕叹息。

2006年12月20日下午写毕

绪 言

陈生玺

《孟子》一书是孟子和他的弟子讨论问答而成。孟子(约前 385—304 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人,曾受业于子思,自称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也曾周游,齐、梁(魏)、鲁、宋、滕等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得任用。最后回到故乡和弟子论列诗书。所以《孟子》一书的主导思想和《论语》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发挥和发展。孟子处在战国的中后期,列国争夺霸权的争斗残酷,战乱频仍,所以《孟子》七篇的议论都是针对当时社会最迫切的问题而发,比较集中,和《论语》又有所不同。

义利之辩 《孟子》开篇即为义利之辩,义是道义,利是利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到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来到这里,那对我的国家会很有利吧?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为什么一开口就讲利呢,只要讲仁义就够了。在这里孟子主张讲仁义而反对讲利益,这是因为当时列国纷争,互相兼并,都想加强自己,既怕被别人兼并而又想兼并别人,所以战乱不已,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痛苦,只有讲求仁义,放弃兼并战争,对老百姓实行仁政,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对梁惠王解释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若讲利,国君说怎样可以利吾国,大夫说怎样利吾家,士庶人说怎样利吾身,这样上下互相争利,国家就危险了。为什么?“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有一万乘兵车的国家,起而杀掉君主的必是有千乘的大夫。有一千乘兵车的国家,起而杀掉国君的必是有百乘的大夫。“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在万乘国家中拥有一千乘,在千乘国家中拥有一百乘,财产本来已经很多了,因为只讲利而不讲义,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完全夺去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样争夺的结果,必是国亡家破,所以只有讲仁义,国家才能安全。“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其身。”(《孟子·尽心下》)诸侯的珍宝有三样:土地、百姓和政事。以珠玉为珍宝者,灾祸一定会降临到身上来。从这里我们看出孟子讲的仁义,是维护人民利益和社会安全的公利,反对诸侯国君、大夫为扩大自己的权利而追求贪得无厌的私利,义利之辩贯穿

于《孟子》全书。义利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各有其特定的内容,但每个时代,人人都应该坚持那个时代的公义,而反对某些集团或个人侵害公义的私利。

王道思想 为了反对诸侯国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孟子提出了王道思想。所谓王道,即王者兴旺之道。就是行仁政,以爱己之心,推己及人。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尊敬自己的长辈,也要推及而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也要推及而爱护别人的儿女;这样治理天下就好像运转在自己的手掌之上。《诗经》上说:先给妻子做榜样,再到兄弟,再进而实施到国家,这说的是把自己的善心扩大到他人而已,所以推广恩泽就能安定天下,不推广恩泽连妻子儿女也保不住,古代圣贤之所以有超过人的地方,就在于善于推广他们好的行为罢了。王道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让人民安心生产,以保证基本的生活需要。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说统治者不要滥事征发民力,妨碍人民按时耕种。只要人民按时耕种,粮食就吃不完;不用细密的网下池捕鱼,鱼鳖就吃不完;砍伐树木按季节时令,木材就用不完。这样老百姓对于养生和死葬都没有什么顾虑和不满,这就是王道的开始。王道要达到的目标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每家有五亩大的宅地,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用丝绵做成的衣服了。能够按时饲养鸡、猪、狗等家畜,七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有肉吃了。一百亩的田地能按时耕种,一家人就没有饥寒了。然后认真举办地方学校,进行孝顺父母尊敬长上的教育,须发斑白的老人不会背着东西在道路上行走。若能这样,国家不兴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王道政治,王道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以能得到人民心悦诚服的服从,实际这就是古代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小康社会。

天时、地利、人和 与王道相对立的是霸道。霸道是用强力强迫人民服从,人民虽然暂时服从了,但不是心服,一有机会就会反抗。所以孟子针对当时诸侯的争霸战争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

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这是说当时诸侯进行战争，有三里长的城，七里长的郭，敌人围攻必定是选择有利的时机，然而仍攻不下，这就是说时机不如地利条件。守方城墙非不高，护城河非不深，兵器非不坚利，粮食非不多，但却弃城逃跑了，这就是说地利条件不如人事的团结。所以限制人民不应该以疆界，巩固国家不能只靠山川险阻，威行天下不能依靠兵器的锐利。实行仁道者能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不行仁道者就很少有人帮助。寡助的人亲戚都会背叛他，多助的人天下之人都愿意顺从他。以天下归顺的力量攻打那众叛亲离之人，君子不战则已，一战必然胜利，因为他是正义的。这是孟子对霸道政治的谴责，是从春秋战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战争与政治关系的一条规律：没有好的政治，不能团结人们，终归是要失败的。这一思想对于后代也很有启发意义。

恒产与恒心 恒产指产业，恒心指道德。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老百姓的行为原则，是有一定的产业才会有有一定的道德心，没有产业，也就没有道德心。假若没有道德心，什么胡作非为的事都会做出来的。等到犯了罪，然后用刑罚来处罚他们，这是在陷害百姓。哪有仁爱的当政者做陷害老百姓的事呢？所以贤明的君主在位，必定节俭用度，以礼待下，取之于民要有节制。要发财就不能仁爱，要仁爱便不能发财。这是孟子对道德与物质生活的基本看法，也是他主张王道政治的出发点之一。为政必须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保有一定的产业，人民才会有有一定的道德心，社会才能保持安定。

批杨、墨 在战国时代，一方面是战乱纷争，一方面是百家异说，当时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除了儒家而外就是杨、墨。杨是杨朱，墨是墨翟。杨朱，魏国人，主张人人应该爱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为也。墨翟，宋国人，主张兼爱，爱无等差，没有亲疏厚薄之分，反对儒家的爱有等差的孝道之说。孟子认为杨、墨都是邪说，正因为这些邪说横行，阻塞了仁义之道的实行，所以他便以批杨、墨为己任。他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

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自春秋以来,圣王不再出现,诸侯肆无忌惮,也不听从周王的命令,一般士人乱发议论。杨朱主张一切为我,就是无君,因为君臣是当时伦常之首。墨翟主张兼爱,对人都一体相爱,爱人之父如同爱己之父,人已没有差别,这就否定了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孝道,等于无父。孟子认为无君无父就等于没有伦常,使人沦为禽兽,这是一种荒谬的学说,从心里产生出来危害事业,危害事业也就危害了政治,故而应该批判,使之不能流行。实际上,人是社会动物,必须生活在人群之中,完全为我也行不通的。墨子主张兼爱,听起来很好,但人已没有亲疏差别,不符合实际,也行不通。

性善说 孟子主张人的天性都是善的,不善是由于后天的习染,通过教育反省人可以回复自己的天性。人都有不忍心看到别人的痛苦而发生怜悯和同情之心,这就是人性善的本原。由这种人性的本原而扩充,便会产生仁、义、礼、智的道德心。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视之,无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当人们看到小孩将掉到井里的时候,都有惊骇同情之心。并不是为了和这个孩子的父母交好,不是为了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名声,也不是厌恶那小孩的哭声,而是自然而然发出的。由此看来,没有惻隐之心就不是人,同样没有羞耻之心就不是人,没有推让之心就不是人,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辞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如同他有四肢一样,是与生俱来的。这里所说的发端就是萌芽开始之意,人将惻隐之心这种萌芽,加以扩充就成为对人的仁爱,将羞恶之心加以扩充就会成为正义,将对长者的推让之心加以扩充就成为礼节,将对事物的辨别能力加以扩充就会成为智慧。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将惻隐之心加以扩充而成为仁人。

当时告子主张人性无善无不善,他的说法是:“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告子上》)人性好比杞柳树,仁义好比杯盘,以人性为仁义,就好比用杞柳树制成杯盘,人性善是被制造而成的。孟子反对告子这种说法,他说:“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同上)你是顺着杞柳的本性来制作杯盘呢?还是要毁伤杞柳的本性制成杯盘呢?如果毁伤杞柳的本性制成杯盘,那不也是毁伤了人的本性而后成为仁义吗?

告子又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人性好比湍急的水流，从东方开了缺口就向东方流，从西方开了缺口就向西方流，人性没有善与不善，好像水没有向东流或向西流一样。孟子反驳他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的。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同上）水确实没有东流西流之分，难道没有上下吗？人性之善，正如水之向下，人没有不善，水没有不向下的，至于水经拍打后可以高过人头，经过阻遏可以引上山，这不是水的本性，而是外在的形势使之如此，人也可以使之不善，变化和水一样，是外在原因造成的。

孟子在论述人性善时，着重指出了人与其他生物的不同点。人是有思想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人可以自己思考自己的行为，人性之所以是善是因为人经过思考，可以自觉发挥自己本性中的善而放弃恶行，不需要别人强迫。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从人的资质而言，可以为善，至于有些人为不善，那不是资质的罪过，是由自己不思考反省的原因。他又重复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之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心，不是外在强加给我的，我心中固有的，只是没有思考罢了，若去思考就能得到，不去思考就会失掉。

尽心知性 孟子认为，人扩充自己的本心，就能知道人的本性，知道人的本性，也就知道了天时人事。所以人要存心养性，保存自己的本心，滋养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通过存心养性就能长期保持仁义之心而不失去。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则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这是说人是天地之中之一分子，人知道人的本性，也就知道怎样对待天命人事了。修养身心，不论是短命或者长寿，以待天命，这样就可以安身立命了。因为人对外在世界总有认识不到而自己无法把握的地方，把这归之于天命，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大多数人是相信天命的。

民贵君轻思想 孟子的王道思想就是以民为本，而春秋战国以来，战乱不已，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痛苦，而发动战争的就是这些想争霸天下的诸侯国，所以他认为导致天下混乱人民受苦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诸侯国君，所以他提出了君轻民贵思想。“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